

# 丁声树同志的治学精神

杨伯峻

丁声树字梧梓,凡是和他相交较早较久的,很少人不称他为梧梓,我写这篇文字,还是习惯地称他梧梓。

他的确是“由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”的知识分子。他的爱国主义不始于坚决拒绝去台湾,而是至迟开始于七七事变时。他于一九三八年写了一篇《诗卷耳芣苢“采采”说》,文末写了一段附言:

去岁卢沟桥之变,岛夷肆虐,冯陵神州。……不自揣量,亦欲放下纸笔,执干戈以卫社稷,遂举十年中藏读之书积存之稿而尽弃之。人事因循,载离寒暑,未遂从戎之愿,空怀报国之心,展转湘滇,仍碌碌于几案间,良足愧也。

自然,怎么样才能真正“卫社稷”,当时只是埋头书本的丁梧梓是不甚了解的,结果落得“空怀报国之心”而已。那几句话,不仅是自愧,其中包含多少酸辛。

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,他喜欢听钱玄同先生的“音韵沿革”和《说文解字》两门选修课。他是玄同先生的得意学生。他熟于《说文》,又于残本《切韵》、《广韵》以及历代韵书、字书有研究。他写的毕业论文,玄同先生给他一百分,一时传为美谈,足见他于古人所谓“小学”功力之深。他又长于“经学”,于《诗经》用力尤深,好几篇关于《诗经》的训诂论文,结论都凿切不移。关于他的治学方法,可以说出下列几点。

第一,能结合实际,解决实际问题。重庆有个北碚,碚字读培,还是读倍,不见于各种字书。不少人也不愿意探讨这个问题的。一则管它读阳平声或者去声,无关宏旨。二则古今字书都没收这个字,在古今若万部书中去寻觅这个字的音读,实在太费劲了。梧梓不这样看待。我不晓得他查了多少书,他却肯定以“碚”为地名的,不止北碚,更有著名的宜昌虾蟆碚、荆门十二碚,于是乎遍考两宋人诗文集和与此有关的书,用各书异体字作“背”,苏轼、苏辙兄弟唱和诗都有“碚”字,依诗的格律,应读去声。另外还用了若干宋人材料作论证。真是狮子搏兔,用尽全力。古今字书所没有的字,今天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却有了,说:“碚,bèi 地名用字:北碚(在四川)。”连注音短短十一个字,得来好不容易!读者试翻阅《“碚”字音读答问》,便足以知道了。山西省南部有个匡河镇,匡字,依晋南方言,应该读 kē。可是自《康熙字典》以后的字书、词典,如《辞源》《中华大字典》《辞海》《国语辞典》都音 ān,没有 kē 音。他于是写了一篇《说‘匡’字音》一文,用历史上各方面的材料来印证,《康熙字典》的 ān 音(邬感反),本于《韵会举要》和《洪武正韵》;而 kē 音(苦合切)却来自《龙龕手鑑》。《康熙字典》的编者,瞧不起《龙龕手鑑》,匡音苦合切,依《康熙字典》自订条例,纵不列入正文,也应“另到备考中”,然而这个音竟未列入备考中。梧梓不惜从若干种书籍中,肯定“匡”字应该读 kē,《龙龕手鑑》的反切是正确的。《现代汉

语词典》“匡”字条说：“匡河 kēhé 地名，在山西”。又说：“匡匡 kēzā 〈书〉围绕。”这短短总共不到二十字的两条，不知费了作者多少心力！由此类推，一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那么多字和词条，几乎倾注他半生精力。以他的博洽矜慎来主编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无怪乎是书行世后不胫而走了。

第二，他每为一文，一定先把有关资料搜集得十分完备。引用各书，必参考不同版本。如果引用“经书”，甚至还参考汉石经残字，如《释否定词‘弗’‘不’》（载于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》）引用《尚书·盘庚中》“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”，便引《隶释》所载《汉石经》“弗”作“不”。又如《广韵》入声“物”韵“弗”纽内有“不”字，并注云，与“弗”同。梧梓考之敦煌唐写本《切韵》残卷，故宫博物院所藏王仁昫《刊缪补缺切韵》和唐写本《唐韵》，“物”韵内都没有“不”字，便断定今本《广韵·物韵》里的“不”字是宋代人所增加。这样细密而认真，一直是他治学和工作负责精神。他的论文所引用的资料是无懈可击的。

第三，他每为一文，不但收集正面例证，更重视反面例证，也列举和他论点不相涉的有关例证。总之，前后左右每个方面都考虑周到。拿《论诗经中的“何”“曷”“胡”》（载于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十本）一文而论，某些用法，只见于《诗经》，《尚书》却和《诗经》有所不同。即使在《诗经》中，也有不同用法，梧梓也举了出来；甚至《易·损·卦辞》只有一条不符合他的论点的例句，他也举出来。再举《诗经“式”字说》（载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六本）一文论，他从“式”字每与“无”字对言，“式”又与“虽”字对言，审其辞气，断定“式”是“应当”之义。复从“式”字说到“职”字，“职”和“式”古音相近，《诗经》“职”字也有和“无”对言的，因此，“职”也和“式”一样，可以解作“应当”。除此之外，《诗经》中还有难以解释的“式”字，他都一一列举出来，好使其他学人继续研究。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，实足以今日治学者的楷模。

第四，他每为一文，不但不抹煞前人的成就，就是同时人的帮助，他一定也注明出来，从不掠美。譬如《诗经“式”字说》，曾引朱熹《诗集传》，然后说：“朱因《诗》之上句言‘虽’，故增‘亦当’二字于下句以足其义，初非以‘当’解‘式’，而适符‘式’字之本旨，妙得诗人之语意矣。”朱熹仅仅偶然得诗人之语意，他也给以说明。又如《诗卷耳荜苜“采采”说》，毛《传》、孔颖达《正义》、朱熹《集传》以至陈奂《毛诗传疏》都把“采采”看作及物动词，“采采卷耳”“采采荜苜”的“采采”是采而又采（采即今之采字），但戴震《诗经补注》、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却认为采采是叠字形容词，形容卷耳和荜苜二种植物的繁茂。自然，戴、马之说是正确的。梧梓既详引了戴、马二人的论证，又把全部《诗经》的叠字考察一番，得出结论，不但《诗经》没有及物动词叠字为用之例，就是先秦群经诸子也没有这个确例。从《诗经》本身构词造句之例已可以证明戴、马二人之说，更何况先秦所有书籍没有毛传说“采采”的及物动词连用的例句呢？梧梓仅仅为证实戴震、马瑞辰之说，不惜将全部《诗经》的叠字加一番整理研究，从而得出确凿结论，但把功劳仍归于戴震、马瑞辰诸人。又如他的《“砮”字音读答问》，曾引郭允蹈《蜀鉴》引《夷陵志》，他注明说：“此条承友人张苑峰先生惠示。”（苑峰是张政烺先生的字。）又如《说“匡”字音》，曾引《新唐书·杨再思传》，又注明：“《杨再思传》一条是高景成同志检示的。”又如《说文引秘书为贾逵说辨正》（载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十一本）一文附记有云陈槃庵（槃）先生曾检示《易纬乾凿度》说“易一条”云云。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，更是今日青年人应该学习的！

（原载《读书》1984.2，刊出前编者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。）